

□ 陈家兴

“硬实力、软实力，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。”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人才越多越好，本事越大越好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，都强调了人才的极端重要性。新时代的中国，也日渐彰显出“聚天下英才而用之”的恢宏气象，令人瞻望未来中国的壮美图景。

历史上，在大业将起之际，或盛世将兴之时，就常常出现延揽天下英才的奇观，而人才建功立业的传奇也随之上演。

看待人才：视人才为祥瑞珍宝

用人首先有一个如何看待人才的问题。这当然不仅是嘴上说人才怎么重要，行为举止上如何爱惜人才而已。比如三国时期的袁绍也很重视人才，礼贤下士，却不知用人之机，把人才当花瓶而已。这实质上不是重视人才，而是屈杀人才。在相当意义上说，只有掂得起人才的分量，才有用得好人才的胆略。

在战国时期的齐威王眼里，人才是珍宝，更让人才在各自岗位上耀亮珍宝之光。想来，如果不是魏惠王这个庸碌之主想在齐威王面前炫耀宝贝，恐怕齐威王视人才为光照千里的珍宝这段佳话，未必会见诸史册。

当时，齐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去郊外狩猎，在闲聊时魏惠王就问，齐国有宝贝不？齐威王说没有。魏惠王就说，我的国家虽然小，也还有十颗大珠子，直径有一寸以上，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，你们齐国这么大，怎么会有宝贝呢？

显然，在魏惠王眼里，只有这些奢华之物。但在齐威王眼里，这些东西又岂在话下？他念兹在兹的是人才。所以听魏惠王这一炫耀，就很潇洒地告诉他，我的臣子中有檀子，让他守南城，楚国就不敢来犯，十二诸侯都来朝奉；有盼子，让他守高唐，赵国人就不敢到我的河边来打鱼；有黔夫，让他守徐州，燕国人就对徐州北门、赵国人就对徐州西门祈福，迁到这里来居住的有七千多户人家；有种首，让他防备盗贼，就出现道不拾遗的景象。然后齐威王豪迈地表示，他们四个人，光照千里之外，怎么能只照亮十二乘车子呢？说得魏惠王大为惭愧，快快而去。

唐太宗眼里的人才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留下的重视人才的话更多。当时，一些大臣喜

“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”

欢恭贺祥瑞，连白鹤在皇宫寝殿的槐树上构巢建窝，臣子也要拍马逢迎说这是祥瑞。太宗头脑清醒得很，说我平常就嘲笑隋炀帝喜好祥瑞，我心里的祥瑞，是得到贤才。一句话就把马屁精们打回了原形。这也说明，唐太宗心心念念的是人才，其他何足挂齿？

唐朝名将李世勣，在并州（太原）任职16年，其治下令行禁止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唐太宗感慨地说，隋炀帝折腾百姓，筑长城来防备突厥进犯，终究是没有什么用。我只需派李世勣守在晋阳，就边尘不惊。“其为长城，岂不壮哉！”把名将比作长城，对人才的倚重由此可见一斑。

延揽人才：挖人不惜用上奇招

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国争相求才。“得人才者得天下，失人才者失天下”是这一时期最真实的写照。秦国之所以最后能胜出，从一个边陲之国而能一统天下，是与其始终注重延揽天下英才分不开的。只要是人才，不管来自哪里，都用之不疑。这样的用人眼界、魄力、气度真是令人感慨。

宋人洪迈在其《容斋随笔》中写道：“独秦不然，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，魏人公孙鞅也。其他若楼缓赵人，张仪、魏冉、范雎皆魏人，蔡泽燕人，吕不韦韩人，李斯楚人。皆委国而听之不疑，卒（最后）之所以兼天下者，诸人之力也。”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贤才，当时或未必有名，或因小过而被他国弃用，或听闻秦国有用武之地而投奔，却最终都被秦国照单全收。

令人称奇的是，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、昭襄王、秦始皇，几位有能力的君主，在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方略上，都保持了高度一致，可

谓深得“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”这一秘诀。而面对不可多得的大贤才，秦国用上了各种招数，亦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比如秦穆公，听说百里奚是个人才，便多方打听他的下落。当时，百里奚是虞国大夫，被晋国俘虏后，被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仆人送到秦国，却在半路上开溜了。听说自己的妻子流落在楚国，便也逃到楚国去。楚成王让他养牛，结果他养的牛和其他人养的牛都不一样，真可谓金子在哪都能闪光。可是楚成王“有眼不识金镶玉”，只是觉得养牛和养马道理相通，便让他养马而已。

秦穆公听说百里奚在楚国，便想用重金赎回。还好只是想了一下而已，否则他再得不到百里奚了。楚成王虽然不识人才，但听到秦国用重金来赎，也还是会立马明白自己手里攥着的居然是稀世奇珍，他又怎么会放手呢？所以，当时秦穆公的谋臣就说，楚成王让他养马，是因为不知道他的才能。不如用逃跑之罪来赎他吧，当初管仲就是这样才从鲁国脱身的。

于是，穆公就派人对楚国说：秦国陪嫁的奴仆百里奚逃到了你们这里，想用五张黑羊皮赎回他。楚国一听，没问题，答应得极是爽快，等百里奚到了秦国，楚成王后悔已是来不及了。百里奚的“五穀大夫”之名，就来源于此。

如果说挖百里奚来，用的是巧计，那么挖西戎的大贤由余，用的则是离间计。由余是晋国人，却在西戎为官。百里奚听说他有经纶之略，总是叹惜不已。当时由余出使秦国，秦穆公亲自领略了一番由余之贤，更是忧心忡忡，说：“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。”他一忧心忡忡，后果就很严重。

穆公问计于内史廖，答曰戎王地处偏僻，



百里奚举于市

没有听过声乐。不妨送他歌女，以夺其心志。再为由余请个假晚点回去，让他们君臣关系疏远。再把由余强留下来，让他爽期。戎王必定生疑，君臣有了嫌隙，就可乘机下手了。而且戎王把精力用在声乐上，必然荒疏政事。

戎王果然中计，在靡靡之音里极尽享受，由余一年不归也不问。然后秦穆公再派由余回去，由余一看戎王变成这样，便力谏苦谏，戎王哪里听得进去？由余便投降了秦国。穆公由余去讨伐戎王，最终“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”。挖其臣，取其国，秦穆公挖人之计确实有点毒辣。

秦昭襄王重视贤才，一点也不亚于秦穆公。他听说孟尝君是大贤，就想把他挖过来用为相。他对齐国说，让弟弟泾阳君为齐国人质，换孟尝君到秦国见一面可好？这时的齐国已经衰败，舍不得孟尝君去，又不得不交换。

后来，孟尝君用了“鸡鸣狗盗之术”逃离了秦国。但故事还没完。昭襄王一计不成，又

生一计，开始离间齐国君臣。到处散布说，天下人只知道有孟尝君，不知道有齐王，不久孟尝君将会代齐自立了。齐王一听这还得了，便把孟尝君的相位给罢免了。

这时候，孟尝君的手下冯谖，利用秦国渴慕大贤的心理，反过来也算计了一下昭襄王，劝他快去迎孟尝君为相。昭襄王一听极是高兴，欢天喜地派人去迎接孟尝君。但冯谖及时把这件事又告诉了齐王，齐王一听不得了，立即又复了孟尝君的相位。秦使只好败兴而归。

在挖人上费尽心机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，在那些雄主眼里，千金易得，贤才难求，为了人才，也真是拼了。



芬芳起于椒兰——谢氏教子观



清代苏六朋《东山捷报图》

□ 赵 威

“襟韵何如，文雅风流，王谢辈人”，与琅琊王氏并称“王谢”的陈郡谢氏，是晋代世家大族的代表。与琅琊王氏不同的是，陈郡谢氏是一个晚起的世家，被时人视作“新出门户”，根基并不深厚。直到淝水之战，谢安、谢玄叔侄以少胜多，扭转乾坤，保全晋室有功，家族地位陡升，与琅琊王氏并列。正如钱穆先生所言，一个家族的兴盛，绝非全部依赖外在之权势与财力，更非故作玄虚的高谈阔论，而是仰赖良好的家教门风。谢氏家风的塑造者便是一代名相谢安，四十岁出仕之前，他一直隐居东山，与文人雅集，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东山集会”。因谢氏兄弟多在外为官，忙于公务，谢安便担起了教育谢氏一门子弟的重任。

为了提高谢家的声望，谢安非常重视家风的传承，尤其注重从人格思想、人生抱负等方面教育子弟。一次，他问众子侄是如何规划人生理想的，看似漫不经心的提问，实则寄予了自己的殷殷期望。谢玄回答说：“譬如芝兰玉树，欲使其生于阶庭耳。”得到了谢安的赞许，他希望子侄都有“芝兰玉树”的品格，而“生于阶庭”则表明了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家庭荣誉息息相关、紧密相连。“芬芳起于椒兰，清响生乎琳琅”，正人君子必须具备高尚美好的品德。

《晋书·谢安传》称谢安“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”，点出了谢氏家风特点，也是谢氏家族保持兴盛的方法之一。谢家看似重自然，倡导玄风，其实骨子里还是以儒家“仪范”训导子弟。谢安常教育子侄：“贤圣去人，其间亦远。”圣贤与一般人的距离并不远，也就是人

人可为尧舜，人和人的才能或许相差很大，但在道德上是可以朝着“完人”的目标去做的，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。

这种对子弟的教育不是一味苛责，而是顺随人性，以相开悟，以德教人。谢安见侄子谢玄喜欢佩戴紫罗香囊，这种脂粉气很浓的物件，在当时贵族青年中很流行，谢安怕他玩物丧志，又不想伤害他的尊严。于是，他以和谢玄打赌的形式，巧妙地赢得香囊，当面烧毁。这种启发式教育，属于不言之教，可谓煞费苦心。谢安的哥哥谢据曾经上屋顶熏老鼠，一时传为笑谈。谢据死后，儿子谢朗听人说起此事，但并不知道那人就是自己的父亲，不止一次跟着讥笑，谢安借和他谈心时，提起这件事说：“外人常以上房熏鼠这件事毁谤你父亲，还说他与和我一起干的这事。”谢朗听后，异常羞愧懊悔，闭门不出一整月。这种启发式的教育还有很多，再如，每逢赏赐臣僚，晋武帝司马炎给尚书吏部郎山涛的东西总是很少，这一现象引起当朝人物的热议。谢安也以此提问点化子侄，谢玄回答说：“当由欲者不多，而使与者忘少。”意思是大概因为他的欲求不多，从而使给予者不觉得给的少。谢安深以为然。

谢安的夫人曾批评他没有尽到教育儿女的责任，他回答说：“我常自教儿。”中国有句老话，一等人用眼教，二等人用话教，三等人用棍教。谢安的教育方法便是以身作则，以独特的方式于潜移默化中影响、教育子女，比眼教、话教、棍教更上一个层次。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谢氏家风的成效，叔侄二人在淝水之战中扭转乾坤，使国家转危为安。

谢安不但以身作则，以仁德教化子侄，而

且不失时机地让子侄跟外人学习，例如经常带着他们参加学术辩论。名僧支遁和谢安交好，二人常常一起辩论学问，一次，尚未成年的侄子谢朗大病初愈，身体还很虚弱，参与了他们的辩论，与支遁越辩越烈。谢朗母亲王夫人站在屏风后听他们辩论太激烈，怕谢朗身体吃不消，一再派人叫他回去，而谢安却留住谢朗。最后，王夫人不得不露面，流着眼泪把谢朗抱了回去。可见，谢安在培养子弟上，是不遗余力的。

谢安与贤达评鉴人物时事，也让子侄旁听。一次，他问李弘度：“你伯父李平阳和尚书令乐广相比怎么样？”李潸然泪下，说：“恐怕难以将二者相比。赵王叛逆篡位，乐广亲自进皇帝玉玺。过世的伯父为人方正，耻于处身乱朝之中，竟至服毒自杀。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，并不是我偏爱伯父才如此说。”谢安转身对谢玄、谢朗说：“有见识的人果然不出人所料。”谢安用意很深，故意出此问题，让忠臣之后亲自回答，借此教育、感化子侄。

中书令王献之去拜访谢安，恰巧习凿齿在座，两人理应同座。可是，因王氏是一流世家，看不上寒族出身的习凿齿，所以不肯和他同座。王献之走后，谢安对谢朗说：“看见了，子敬（王献之字子敬）向来清高，只是太做作了，过分矜持，有损自然天成的本质。”言外之意，做人可不要像王献之那样高傲。

一流的世家大族，必是一流的文化世家，谢安同样注重子弟的学识修养，谢家的文学雅集尤为后人津津乐道。一次，在一个寒冷的落雪之日，谢安召集子侄，讨论文章义理。不一会儿，雪下大了，谢安兴致勃勃地问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”侄子谢朗对曰：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“撒盐”是晋代社会的一种风俗，每逢不吉利或将参加有危险的事之前，向空中及身上撒盐，以避邪气，祛除不祥。显然此句毫无文学美感，这时，侄女谢道韞说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谢安开怀大笑，认为一个撒盐，一个柳絮，文学意境高下立判。还有一次，谢安问众子侄：“《毛诗》中哪句最好？”侄儿谢遏道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谢安不以为然：“谶定命，远献辰告。”我认为此句最有风雅之人深远的意趣。”在优良家风与学风的引导下，谢氏家族文武兼修，培养出了许多文化大家，如谢万、谢道韞、谢灵运、谢朓等等，人才济济，成就了许多文坛佳话。据史籍记载，谢家子弟几乎人人能文，谢混、谢灵运、谢朓更是山水文学的代表人物，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

古人 在识人用人过程中，非常注重“名”与“实”这对关系。古代社会许多官员向往的就是具有儒者之风行事风格的儒官，践行儒家思想观念，将仁义礼智信贯彻到实处。王夫之说：“因义而立，谓之名义；有节而不可逾，谓之名节；君之求于士者，节义而已。”然而，也不乏崇尚虚名、追求浮华的人，古人也讲：“好名为士之大戒”。

汉宣帝执政的时候，发现许多地方官经常说大话、空话、假话，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，为博得虚名而且态百出。汉宣帝中伤这些人说：“考察所行以质其言，有名实不相应，必知其所以然。”如果汉宣帝对臣僚的名不副实不予以纠正而任其发展，必然会导致国家衰微。唐玄宗后期政治黑暗，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喜好阿谀之语，忠奸不分，最终酿成安史之乱。如果皇帝重名轻实，大臣们亦会受到皇帝言行影响，势必会造成朝廷黑暗、政治腐败、国家衰微。

康熙时期的名臣汤斌，就是一个典型的老实人、老实官。这种老实体现在很多方面。在京考进取士后，他能够自甘清苦，潜心留意古今治国之道，以益时政，冷静对待功名。当时他向康熙进言，每幕后朝修史，都会将前朝忠勇义士当成榜样记入史册，清朝修明史，也要正确对待明朝义士。他的建议虽然遭到朝臣攻讦，但得到康熙赞赏，因为这种行为是老实人为国着想的值得鼓励的行为。汤斌随后赴地方当官，不久辞官休假，回家为父守丧，守丧期满后，听闻名士孙奇逢在夏峰讲学，“负笈往从”，不断夯实自己的学问基础。汤斌内心只是希望自己多学点知识，以后能够为国家更好地效力，这种踏实稳健的作风，使得他的仕途之路走得更为顺畅。康熙十七年，下诏开博学鸿儒科，汤斌应试，考得一等，授翰林院侍讲，得到康熙的信任和重用。不久之后，康熙派汤斌去江苏，移风易俗，改善当地颓废的社会风气。到了江苏后，汤斌发现江苏由于遭受水灾，农民耕种负担很重，据此向康熙进言，希望康熙能够减免江苏赋税，以轻百姓之重，没有实事求是的作风，是不会向皇帝提出这个建议的，康熙批准了他的建议，江苏的发展很快就呈现出繁荣的局面。因政绩卓越，汤斌被提拔到京城做官，他不依附权贵，在当时朋党苗头已出的局面下，实数一股清流。在朝为官，汤斌不阿从权贵明珠一党，秉公做事，遭到明珠一党的攻击。然而，康熙始终信任重用他，直到汤斌去世。

清朝道光年间的名臣陶澍，在道光年间历任陕西按察使、安徽布政使、安徽巡抚、江苏巡抚，官至两江总督，死后谥号“文毅”，晋赠太子太保。他在地方任职期间，之所以政绩卓越，在于任用了一批富有实干精神的官员，这些富有实干精神的官员立足岗位、认真履职、兢兢业业，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。难能可贵的是陶澍还推荐了这些实心干事的千吏。其中赏识、推荐苏元璐就是

「名」与「实」——几对识人用人标准的历史镜鉴

□ 石志刚

典型例子。当陶澍在安徽任职的时候，发现安徽宿州知州苏元璐在匪患严重的管辖片区内，能够认真做事，敢于面对“难治”之局面，通过三年的努力，“匪棍多经就获，凶暴之徒均知敛迹，命案渐少”，这就为宿州安定的政治环境奠定了基础。苏元璐治理匪患取得了显著成效，在此基础上，又着手改善民生，并且把重点放在劝课农桑方面，“劝民开浚沟渠，俾资蓄泄”，使得许多人受益，“行旅农田，均称便益”。陶澍在道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向皇帝陈奏，希望道光帝能够提拔苏元璐。陶澍在推荐苏元璐的折子中说：“臣查宿州知州苏元璐办事实心，勤求治理，舆情相安，实属地方得力之员。”不久之后，道光擢升了苏元璐：“洵为地方得力之员，着加恩赏加同知衔，仍留宿州之任，以示奖励。”

这些统治者之所以对于实事的儒臣信任有加，原因在于他们身上有一种当老实人的气派和决心，有了这个气派和决心，国家治理和吏治整顿就会有希望。

